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现代卷

本卷主编 邓丽兰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现代卷

本卷主编 邓丽兰

撰稿人 邓丽兰 王红霞 刘卓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现代卷/邓丽兰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9401-1

I. ①中… II. ①邓…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现代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518 号

总主编 刘泽华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现代卷

本卷主编 邓丽兰

Zhongguo Zhengzhi Sixiang Tongshi · Xianda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37 插页 3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60 000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序

这套九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终于出版了，关于这套书的旨趣，在综论卷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不再重复。这里只说几句有关的题外话。

1949年以前政治思想史的著作还是比较多的，这与当时很多高等院校设有政治系以及社会热烈议论政治有极大关系。1952年院系大调整之后，随着政治系基本被取消和政治一元化的强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随之被边缘化，只在哲学史、思想史中有一点点观照。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几位还默默坚守在这个领域，且主要是近现代史，集中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何干之主持，接续了香火，功莫大焉！

作为一门学科重新启动，应该说是与20世纪80年代陆续恢复的政治学学科设置和倡导社会思想解放相伴。

就我个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初涉中国思想史时读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他在“序言”中说，“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由此想到，研究历史不研究思想史是极大缺憾，而研究思想史不关注政治思想，则无所归。后来又读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钱穆当时是被批判的代表人物，但他说的中国的士人以政治为宗教，对我也很有启发。

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的作用太大了，君主对所有臣民和整个资源具有最高的掌控权，王权支配社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与之相应，政治思想必然处于社会观念的主导地位，而王权神圣则是其核心。因此不研究政治思想史就很难解析中国历史的真谛。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盘桓，而反思“文革”中封建主义观念登峰造极的大泛滥，又给我以“使命”感。1984年拙作《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了，我自认为此书突破了把政治与阶级性等同的框框，提出政治不仅有阶级性，还有社会性。全书没有给任何一位思想家戴阶级的帽子。同时还提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即是君主专制主义，先秦诸子争论的主流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主义，这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基础。应该说这两个主要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影响，也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有两次会议对推动政治思想史研究起了明显的作用：一次是1985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讨论会”；另一次是1987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的第一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学术讨论会”。承办者都是政治学系，我作为行外人（历史系）也忝列发起者之中。

政治思想在学科上属于政治学，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但我置身于历史学，这样就出现了学科与人身归属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一直想申请一个多卷本的项目，由于项目在政治学范围内，而我人却在历史学，历史学又没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项目，因此两次申请皆因学科畴域等问题而被否决。其实我完全有机会移身到政治学去，但我的根底在历史学，不能为项目移身，又不能更改我的研究方向，只好蹒跚地坚持走自己的路了。

说实在的，要想搞大一点儿的项目、吸纳较多的人参加，没有必要的资金支持还真的有很多难处。所以搞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设想一拖再拖，但我从来没有灰心。相信机会会有的，但我的原则是“不期而遇”。

2005年前后教育部要在文科组建创新基地，可我已临近古稀，即将退休。我是一个“好事”之徒，退休与否与做事不相干，我提议组建一个以“思想与社会”为名的基地，此意得到南开大学学校领导、历史学院和文科各系的支持。说来也巧，竟然被批准了。我有幸被诸位老弟推举为首席专家，于是组织撰写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机会真的来了，可以说是又一次“不期而遇”。

我虽任总主编，起了一点儿发起和组织的作用，也举行过多次研讨会，但参加者都是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其中多位是博士生导师，对如何撰写由他们自行其是。我所做的主要是催促进度。由于他们都是忙人，催促的效用也有限，直到2012年才把稿子集齐。

我们一群人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同仁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这里仍需深深感谢他们再一次的鼎力支持和理解！从扶持学科发展来说，他们承继了何干之的精神！

刘泽华谨记
2013年岁末

目 录

导 论 民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第一章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 第一节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国家观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7
- 第二节 民间民族主义的嬗变与分流 21
- 第三节 民间民族主义的嬗变：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论 70
- 第四节 官方民族主义的推进与困境 90

第二章 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 第一节 军阀政治下的民主共和诉求 111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建立后的自由主义抗争 128
- 第三节 战后自由主义思潮的高潮 172

第三章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身后的演变

- 第一节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演变 203
- 第二节 “儒化”的三民主义 214
- 第三节 遗教派的三民主义论 235
- 第四节 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253
- 第五节 新生命派的三民主义论 264
- 第六节 第三党的政治主张 287
- 第七节 托派的三民主义论 303

第四章 各种社会主义的流行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	317
第二节 空想社会主义	341
第三节 改良社会主义	360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大讨论	397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

第一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12
第二节 从国民革命论到苏维埃革命理论	435
第三节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61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理论	496

第六章 民国史上的重大思想论争

第一节 政党、政制与主义	509
第二节 政治与社会转型	543
第三节 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的探索	562
参考文献	581
后 记	587

导 论

民国政治思想的演进及特征

中华民国的建立，为相对的思想自由提供一定的舆论空间。民国时代的思想界，其思想之丰富、复杂、多变，不亚于任何历史时代。“问题”层出不穷，“主义”也不断翻新。深重的社会危机与冲突矛盾，要求思想者提供解决疑难之方术。外来的新鲜刺激的思想知识，又给思想者提供无穷的灵感与资源。或因不同的经验与事实，或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或立足不同的思想流派，又引发诸多的思想论争。显然，承平之世是难以产生深刻的思想家的，只有当时代面临困局，社会经历转型的阵痛，思想者的神经才会变得敏锐，思想才会展开翅膀，思想论争才喷发出火花，一个普通的思想者才可能升华为思想家。

民国时代的政治思想，多是舶来品。来源于西方的政治话语，通过翻译而进入中国思想界。而形形色色的西方资源中，哪些思想仅仅是过眼烟云，哪些则对中国知识界具有更长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中国的思想家们是在怎样的现实政治状况、面临怎样的现实政治问题时，去拣选、利用、改造这些思想资源的？他们自己原有的思想体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与调整？思想的熔铸过程中，哪些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学理层面与现实对策又是如何交错、支持与抵触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

19世纪至20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出现了两大重要现象。一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此消彼长。19世纪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的鼓动下，西方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状态。但由此引发的贫富分化、阶级冲突的加剧，使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改写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径。另一重要的思想现象，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此消彼长。一方面，世界主义的理想在人类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下进行；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仍是左右国际国内政治的重要杠杆。在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诉求占压倒性的地位。

民国政治思想，深深受到各种外来主义的刺激与影响，导致政治理想的分

化,以及各种主义的争奇斗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种追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心态,追求一揽子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使“主义”成为重要的思想特征,得到迅速传播。1919年发生在胡适、李大钊、蓝公武等人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预示着民国思想界将走入一个被“主义”笼罩的时代。

“主义”作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话语浮现出来,在中国引发出思想上的战争。当思考问题、付诸行动的举措升华到“主义”时,政治认同感、拒斥感,皆表现出来。

救亡图存意识的强化,一方面因外来的危机。本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为提升国际地位,但结局却是战败国的待遇,因此民族危亡的意识再次凸显出来。亡国灭种的焦虑再次浮现。救亡图存意识的强化,也因内在危机的加深。这主要在于,辛亥革命后,移植西方政治制度没有成功,国会、政党都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中国再次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军阀之间的混战成为列强嘲弄中国的口实。思想界出现迷惘:中国的出路何在?

救亡意识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人群中,自然有着不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而救国方案、救国道路的摸索和寻求,成为当时一种共同的焦虑。当时,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救国工具,来完成重建民族国家的宏愿。国会不能救国,政党不能救国,人们寄希望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而“主义”救国,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思路。

民国时期的思想史,是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对抗、对话中展开的。救亡主题,使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政治思维方式。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主潮,成为各个思想派别共同的“底色”。

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发端源自清末新知识群体,从日本转译的西学知识使德国的国家哲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仅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及抗战胜利后昙花一现。知识界对于国家学说的学理性探讨追随着社会连带主义、政治多元主义,民族主义诉求则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完成了思想社会化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问题的思考,一直存在着两个层面,即现实政治与学术探讨。德国国家哲学在中国的流行并不仅仅因为转借日译西学的学术层面的原因。德国式的国家主义契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德意志民族主义所构建的“民族神”,与中国“家国同构”、群体本位的政治文化是相吻合的。中国没有受过启蒙运动的洗礼,对皇帝的崇拜自然也容易转化为对国家的崇拜。在取法形形色色的西方资源时,现实需要往往又决定着思想的取舍。德国式的国家主义适

合中国现实需要。强个人、弱国家的模式，适合高度民主化、社会力量发达的国家，不甚适合中国甚至亚洲社会。一个地广人众、未能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必然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完成政治动员。期待自发的经济力量作为看不见的手，或一盘散沙式的民众来建设成就英美式的国家，是不现实的。

三民主义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政治思潮，民国时代，它由一种在野的思潮，变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信仰，被国民党人奉为唯一正确的治国理念，几乎享有政治神学的地位。但孙中山去世后，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则趋于多元化，国民党的左翼对之做唯物史观式的解释，其右翼则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儒学化。三民主义在享有正统地位的同时，也日益僵化、教条化。

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近代以来，自严复翻译《群己权界论》，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国，中国思想界也广泛吸收其基本的思想元素。不过，追溯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我们看到的是，虽然追求自由的精神不绝如缕，但总的倾向是低水平重复，经典被遗忘或被忽视，而缺乏一个积累、发展的脉络。也就是说，缺乏一个认识升华的过程。人们热衷于某些政论式的常识性言说，而欠缺系统性的理论阐发。从民初政党性刊物，到1947—1948年前后有关自由主义的大讨论，这一倾向贯穿民国知识界。

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多元的思想源流与演化。既有相对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也有更为激越的无政府主义，还有空想式的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它们流行的时间或短或长，但都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受苏俄革命理论的影响，因此一开始便与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划清了界限，选择了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苏联国内革命阵营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斗争。困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问题是“革命时刻表”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还是发生在较为遥远的将来？当共产党人较为独立地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他们才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和“联合政府”的前景。但是，“革命时刻表”问题一直延续至共和国时期。

各派“主义”围绕着一个基本关系、两个基本观念、两种不同的正义而展开，即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自由、平等两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正义。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划分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野；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的追求的各自侧重，区别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不同；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同，区分了各种浪漫主

义的制度改革方案与宪政主义的差别。

传统政治思想、制度失去正当性后，外来的思想、制度无疑将成为引导实际政治的蓝图。世界思潮的格局，也影响了民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走向。然而，西方文化的危机，导致西方思想的歧路发展。西方思潮的此消彼长，都在中国思想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从西方引入的话语，使民国时代的思想界，主要成为西方思想论争的论场，无论激进、保守、温和，均被西风所影响。这些移植的思想各有其源流，历史的差异、国别的差异、流派的差异，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往往界限变得含混、模糊。受此影响，某些重要的思想家及思想流派的转向，很难有其自身清晰的内在逻辑与演变的理路，而是思想发展中出现鲜明的裂变、跳跃、转折。这是因为，思想的发展不是沿着自身认识的深化或问题的转进，而是因为外来新思想的刺激与触发。因此，有时思想的变化与其说是个人理性思考的产物，不如说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的结果。

思想的裂变，常常表现为思想论争。思想论争成为民国政治思想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北京政府时代的思想论战就有新旧思想之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好人政府主义之讨论、造党非党之争等；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思想论战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人权与约法之争、宪政与训政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抗战胜利前后的思想论战有思想统一与思想自由之争、真假三民主义之争、新启蒙运动的讨论、自由主义的讨论等等。

而在自由与平等这对核心政治概念中，民国时代的思想家们明显出现了价值偏向。对平等理念的青睐，使社会主义成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有相当的亲和性，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以后主导了中国思想界。流行于中国知识精英当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往往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置换与改写，民国知识界即已观察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流趋势。“这两种思潮开始是冲突的，敌对的，也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但最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大有合流的趋势，折中的倾向”。英国是自由主义的营垒，但著名的思想家都已经有熔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于一炉的倾向，“社会主义在某一意义上，也已变质，它已容纳了自由主义中的某些特征。这一混合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折中的路，大体上应为今后世界政治所必遵循的路途”^①。

民国政治思想的超越性体现在，民国以来的各个思想派别，都带着某种理想主义气质，比较远离具体政治实践。无论是国家主义派期待的全民主义远景，还

^① 吴恩裕：《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趋势》，载《东方杂志》42卷16号，1946-08-15。

是国民党人勾画的三民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人坚信的共产主义前途，都是一种超越现代西方政治社会的政治蓝图。与英美政治哲学的实践性品格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则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的浪漫品格，这就是对“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追求。这一传统不自觉地影响了民国思想界的思维方式，“根本社会改造”的呼声反映的就是塑造一个全新时代的期许。其次，在外来压力之下的“赶超”意识，为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不得不使自己“后来居上”，不得不设计比英、美更先进的政治治国方案。这也带来了政治理想的激进化。

这种超越性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主要是因为思想相对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发展。思想并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被动产物，许多思想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逻辑无关。民国政治思想的演变主要不受内缘性因素的影响，而更多的受外缘性因素的影响。

民国政治思想的批判性则体现在，对外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对内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遗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西方社会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扬弃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民生主义则扬弃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在批判西方的文化派别。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各思想派别有东方文化派与西方文化派的差异，但在政治思想层面，短暂的复辟浪潮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没有人对传统君主制度有留念之想。

民国政治思想的批判性、超越性，决定了政治理想、政治变革方式的激进化。思想领域，“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是两对重要的词语。如果说，改良是一种保守的姿态，革命，就是一种激进的姿态。传统意义上，“激进”与“保守”呈现截然二分的状态。政治现实中，两者是变动的、交错的。飞速发展的时代，会使一度的激进派，很快成为落伍者。政治上的保守派，也许会成为文化上的激进派。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抗现存社会秩序的时候最为激烈，在留念小生产方式的时候却是最保守的。

政治共识的缺位，是民国政治思想演进的另一特征。一个政治共同体，只有具有一定的政治共识，才可能建立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思想的经学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缺乏宽容、多元的心态，往往导致极端的政治排他性，使得本来开放的思想，变成僵硬的政治宗教。民国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是形成一定政治共识的时期，这种“重叠共识”成为正常政治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往往也是战场上干戈相见的时刻。民国时代，许多思想观点相近的流派，往往成为你死我活的思想上的敌人。例如，对于“经济民主”的向往，几乎是所有思想流派的共性，差别只在程度、手段的不同。但各派

思想之间，却没有形成政治共识。三民主义，从作为多元思想中的一个流派，到演变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激进思想蜕化成政治教条的一个典型。

因此，民国时代的思想界各派表现出短暂的思想联盟、长期的思想对立。思想联盟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各党派暂时认同了三民主义话语，其他时候，则充满了思想交锋。

第一章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西文 nationalism 在中文中有多种翻译，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族国主义”、“国民主义”、“国族主义”，等等。现多取“民族主义”。从内容上，民族主义又可分为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从态度上，民族主义又可分为理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从立场上分，又可分为官方民族主义、民间民族主义，等等。本章主要从官方、民间民族主义的分野与互动角度，梳理政治民族主义的演进脉络。

第一节 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国家观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如何构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构成政治学的主题。近代西方思想中，英美思想与欧陆思想的差异，在国家观念问题上体现为国家究竟是一种最高伦理，抑或仅仅是一种个人或社会的工具的分歧。英美式的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国家观念，强调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要求个人价值的绝对化与国家权力的最小化。反之，德意志以绝对精神为象征的国家哲学，则强调国家价值的至高无上性，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过程中，左右着德国政治史的走向，形成与启蒙哲学的世界主义倾向不同的思想格局。

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起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开了近代国家观的先河。他从人的本性与政治生活出发，而不是从神意或道德出发，来探讨国家。法国思想家布丹的国家主权说则奠定了现代国家概念的基础。布丹强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其特点在于绝对性、永久性、不可转让性、不可分割性。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各国的君主既战胜了教皇的权威，也征服了领土之内的封建王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成为人类生活的

主要政治共同体。

以强调国家至上为特征的德国政治哲学则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典型。德国式的国家观念同德国哲学、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演化、文化特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康德的国家观仍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接受了国家观念上的社会契约论。耶拿战役前，费希特还是一个以欧洲为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战后法国对德国的占领，使他转化为一个国家主义者。费希特的政治哲学是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费希特认为，要国家的统一，先要国民精神的统一。合于理性的国家不是现成建立的，必须从培育和教化民族开始。他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建国运动。黑格尔则建构完成了德国国家哲学的基本理念。他以国家为目的，个人为手段，视国家为伦理观念的现实。黑格尔还强调作为世界精神代表的统治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权力。在黑格尔之后为德国国家哲学增添新内容的包括特来齐克的国家权力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等。特来齐克认为，国民应绝对服从国家之目的，决定国家之目的则为政府。伯伦知理认为，国家是个有机体，有其四肢五脏、筋脉血轮，有其意志和行动，与人无异。德国的国家哲学主张国家至上的观点，强调国家是最高目的，而不是工具，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甚至作出牺牲。正如民国时期学者所认为的：“德意志民族唯一超越为主之观念即其国家之观念，其他人生之伦理，社会之道德及一切之哲学思想，皆是在此种国家观念势力之下，而受其影响与支配。”^① 德国式的国家观念，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影响深远。

在西风东渐的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往往由思想观念的变化所引领。从华夷之辨的朴素族类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西方提供了中国思想界国家观念的知识资源。英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虽然在五四前后及抗战胜利前后流行一时，但在中国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德国式的国家至上的国家哲学。

一、两种国家观：民族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

现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发端源自清末新知识群体。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华夷之辨、满汉界限之类的族类观念仍是鼓励民间反抗的动力，如断发改装，借助“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的历史记忆，使用孔子、黄帝纪年，宣传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等等。另一方面，西方思想为清末士人提供了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新想象。主权观念的萌发是现代国家观念的最显著标志。清

^① 何思源：《德国民族及德国人之国家观念》，载《东方杂志》21卷18号，1924-09-25。

末知识界开始认识到，主权存，国家存，主权亡，国家亡。19世纪是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最盛时代，如意大利之统一，德国之联邦，希腊、罗马尼亚之独立等等。新知识界运用上述世界史知识，构建亡国史、建国史，从中吸取救亡图存的力量。

在各西方思想中，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尤其影响了晚清中国知识界。^①当时的维新派报刊《清议报》、《新民丛报》，革命派报刊《译书汇编》等，皆从日文节译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文中，极力推崇伯伦知理之学说，称卢梭立于18世纪，而为19世纪之母，伯氏立于19世纪，而为20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伯伦知理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②梁启超接受德国国家哲学，正是通过日本的中转来完成的。

“民族”一词是晚清中国知识界在引进日译西学时采用的。梁启超应是中国最早宣传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通过阅读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介绍欧洲国家观念的演变，公开称民族主义为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他说：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③

梁启超还反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在国权与民权之消长之间，应倚重国权主义^④。

不过，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宣传与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并行不悖。反对清王朝不仅因为异族统治，也因为这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王朝。与民族主义相伴随的是

① 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载《政治学报》，1971（1）；夏良才：《孙中山的国家观与欧洲“主权国家”学派》，载《近代史研究》，1992（5）；[法]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载《近代史研究》，1997（4）。

②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载《新民丛报》第1号，1902-02-08。

③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六》，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④ Nationalism 在近代以来有多种译法，如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族国主义、国权主义等。

对新型民主政治的向往，中国新知识界向往的是一个英美式的新民族国家。他们公开呼吁，国为人民之公产，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民权之集，是为国权；民而无权，国权何有？”^①

从日本转译的西学知识使德国的国家哲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这不仅是学术路径的规定所至，更多的是内外民族危机的压力使然。但是，王权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民权时代的到来。民初以降，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国会制度的畸变、政党政治的受挫，都表明移植型的政治体系面临政治秩序危机，人们所盼望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并未到来。因此，新文化运动前期，新知识界在民主、科学的口号之下，一度强调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对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属于北大《新青年》阵营的高一涵被视为该杂志作者中政论文字最有深度者之一，整理形成高一涵国家观念的思想资源之学术理路，可观察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国家观的若干特征。

粗略浏览高一涵五四前后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说，感觉十分驳杂，像是日本明治大学课本与教学参考书的综合体。但仔细研读，则发现这是一个青年学者努力攻读政治学教科书后形成个人国家观的过程。在《青年杂志》1卷2号，他翻译了伯伦知理《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这显然与梁启超早年读过的伯伦知理之书是同样内容的著述。在杂志1卷3号上，他的《民约与邦本》则介绍了社会契约论。文中，他突出了霍布斯、洛克、卢梭对于民约论的贡献。1卷4号上的《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则是一篇重头文章，阐述国家之目的，其自由主义国家观的底蕴在此文中得以展示。显然，高一涵已进行了更多的阅读，他分别介绍了柏拉图、黑格尔以“道德论”和亚里士多德以“幸福论”为国家目的的“绝对蕲向”说，又介绍了处于另一端的洛克、康德、韩鲍德（Humboldt）、斯宾塞等以“保护权利说”作为国家目的的另一“绝对蕲向”说。同时，他介绍了国家目的问题上的相对论，即将国家目的作层次划分的观点，如德国学者郝尊道（Holtzendorff）和伯伦知理、美国学者柏哲士（J. B. Burgess）、日本法学博士小野冢喜平次等的看法，指出其共通之处在于：“皆以国家之蕲向，为循序渐进，始奠国家生存之本基，继求小己社会之自由之权利，终则鼓舞振兴世界人类之文明者也。”^②在此基础上，高一涵提出了自己融合“绝对蕲向”与“相对蕲向”的国家观，即，国家的绝对目的，在于“保护权利”，以维持国家生存及个人自

^① 《二十世纪之中国》，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69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② 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载《青年杂志》1卷4号，1915-12-15。